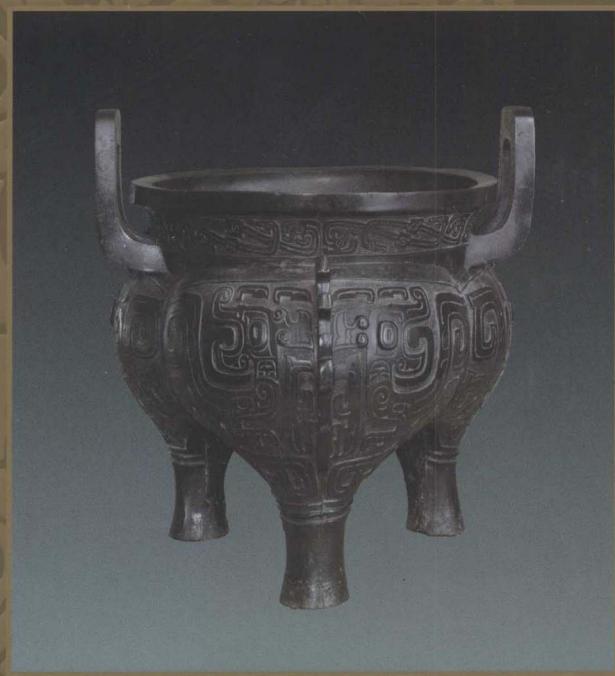


青銅禮樂樂器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商務印書館

港台书

卷

K876.412

2012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青銅禮樂器



主編：杜迺松
商務印書館

青銅禮樂器

Bronze Ritual Vessels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reasures
of the Palace Museum

主編 杜迺松

副主編 王海文 丁孟

編委 紀宏章 何林 李米佳 郭玉海

攝影 趙山

出版人 陳萬雄

編輯顧問 吳空

責任編輯 段國強 徐昕宇

設計 張婉儀

出版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 3 號東滙廣場 8 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製版 深圳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平湖鎮春湖工業區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印刷 深圳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平湖鎮春湖工業區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版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2006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13 - 978 962 07 5341 1
ISBN 10 - 962 07 5341 0

版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其他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

© 2006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and/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All inquiries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8/F., Eastern Central Plaza, 3 Yiu Hing Road, Shau Kei Wan, Hong Kong.

故宮

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特邀顧問：（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世襄 王 堯 李學勤
金維諾 宿 白 張政烺

總編委主任委員：鄭欣淼

委 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杜迺松 李 季 李文儒
李輝柄 余 輝 邵長波
胡 錘 施安昌 耿寶昌
晉宏達 徐邦達 徐啟憲
陳麗華 張忠培 單國強
楊 新 楊伯達 鄭珉中
鄭欣淼 蕭燕翼 許崇正

主 編：李文儒 楊 新

編委辦公室：

主任：徐啟憲
成 員：李輝柄 杜迺松 余 輝
邵長波 胡 錘 施安昌
秦鳳京 郭福祥 陳麗華
單國強 鄭珉中 許崇正

總攝影：胡 錘



總序

楊
新

故宮博物院是在明、清兩代皇宮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家博物館，位於北京市中心，佔地72萬平方米，收藏文物近百萬件。

公元1406年，明代永樂皇帝朱棣下詔將北平升為北京，翌年即在元代舊宮的基址上，開始大規模營造新的宮殿。公元1420年宮殿落成，稱紫禁城，正式遷都北京。公元1644年，清王朝取代明帝國統治，仍建都北京，居住在紫禁城內。按古老的禮制，紫禁城內分前朝、後寢兩大部分。前朝包括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輔以文華、武英兩殿。後寢包括乾清、交泰、坤寧三宮及東、西六宮等，總稱內廷。明、清兩代，從永樂皇帝朱棣至末代皇帝溥儀，共有24位皇帝及其后妃都居住在這裏。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統治，結束了兩千餘年的封建帝制。1914年，北洋政府將瀋陽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的部分文物移來，在紫禁城內前朝部分成立古物陳列所。1924年，溥儀被逐出內廷，紫禁城後半部分於1925年建成故宮博物院。

歷代以來，皇帝們都自稱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他們把全國的土地和人民視作自己的財產。因此在宮廷內，不但匯集了從全國各地進貢來的各種歷史文化藝術精品和奇珍異寶，而且也集中了全國最優秀的藝術家和匠師，創造新的文化藝術品。中間雖屢經改朝換代，宮廷中的收藏損失無法估計，但是，由於中國的國土遼闊，歷史悠久，人民富於創造，文物散而復聚。清代繼承明代宮廷遺產，到乾隆時期，宮廷中收藏之富，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到清代末年，英法聯軍、八國聯軍兩度侵入北京，橫燒劫掠，文物損失散佚殆不少。溥儀居內廷時，以賞賜、送禮等名義將文物盜出宮外，手下人亦效其尤，至1923年中正殿大火，清宮文物再次遭到嚴重損失。儘管如此，清宮的收藏仍然可觀。在故宮博物院籌備建立時，由“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對其所藏進行了清點，事竣後整理刊印出《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共六編28

冊，計有文物117萬餘件（套）。1947年底，古物陳列所併入故宮博物院，其文物同時亦歸故宮博物院收藏管理。

二次大戰期間，為了保護故宮文物不至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掠奪和戰火的毀滅，故宮博物院從大量的藏品中檢選出器物、書畫、圖書、檔案共計13427箱又64包，分五批運至上海和南京，後又輾轉流散到川、黔各地。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文物復又運回南京。隨着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在南京的文物又有2972箱於1948年底至1949年被運往台灣，50年代南京文物大部分運返北京，尚有2211箱至今仍存放在故宮博物院於南京建造的庫房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故宮博物院的體制有所變化，根據當時上級的有關指令，原宮廷中收藏圖書中的一部分，被調撥到北京圖書館，而檔案文獻，則另成立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負責收藏保管。

50至60年代，故宮博物院對北京本院的文物重新進行了清理核對，按新的觀念，把過去劃分“器物”和書畫類的才被編入文物的範疇，凡屬於清宮舊藏的，均給予“故”字編號，計有711338件，其中從過去未被登記的“物品”堆中發現1200餘件。作為國家最大博物館，故宮博物院肩負有蒐藏保護流散在社會上珍貴文物的責任。1949年以後，通過收購、調撥、交換和接受捐贈等渠道以豐富館藏。凡屬新入藏的，均給予“新”字編號，截至1994年底，計有222920件。

這近百萬件文物，蘊藏着中華民族文化藝術極其豐富的史料。其遠自原始社會、商、周、秦、漢，經魏、晉、南北朝、隋、唐，歷五代兩宋、元、明，而至於清代和近世。歷朝歷代，均有佳品，從未有間斷。其文物品類，一應俱有，有青銅、玉器、陶瓷、碑刻造像、法書名畫、印璽、漆器、琺瑯、絲織刺繡、竹木牙骨雕刻、金銀器皿、文房珍玩、鐘錶、珠翠首飾、家具以及其他歷史文物等等。每一品種，又自成歷史系列。可以說這是一座巨大的東方文化藝術寶庫，不但集中反映了中華民族數千年文化藝術的歷史發展，凝聚着中國人民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時它也是人類文明進步不可缺少的組成元素。

開發這座寶庫，弘揚民族文化傳統，為社會提供了解和研究這一傳統的可信史料，是故宮博物院的重要任務之一。過去我院曾經通過編輯出版各種圖書、畫冊、刊物，為提供這方面資料作了不少工作，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對於推動各科學術的深入研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一種全面而系統地介紹故宮文物以一窺全豹的出版物，由於種種原因，尚未來得及進行。今天，隨着社會的物質生活的提高，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頻繁往來，

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人們越來越多地注意到故宮。學者專家們，無論是專門研究中國的文化歷史，還是從事於東、西方文化的對比研究，也都希望從故宮的藏品中發掘資料，以探索人類文明發展的奧秘。因此，我們決定與香港商務印書館共同努力，合作出版一套全面系統地反映故宮文物收藏的大型圖冊。

要想無一遺漏將近百萬件文物全都出版，我想在近數十年內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在考慮到社會需要的同時，不能不採取精選的辦法，百裏挑一，將那些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文物集中起來，約有一萬二千餘件，分成六十卷出版，故名《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這需要八至十年時間才能完成，可以說是一項跨世紀的工程。六十卷的體例，我們採取按文物分類的方法進行編排，但是不囿於這一方法。例如其中一些與宮廷歷史、典章制度及日常生活有直接關係的文物，則採用特定主題的編輯方法。這部分是最具有宮廷特色的文物，以往常被人們所忽視，而在學術研究深入發展的今天，卻越來越顯示出其重要歷史價值。另外，對某一類數量較多的文物，例如繪畫和陶瓷，則採用每一卷或幾卷具有相對獨立和完整的編排方法，以便於讀者的需要和選購。

如此浩大的工程，其任務是艱巨的。為此我們動員了全院的文物研究者一道工作。由院內老一輩專家和聘請院外若干著名學者為顧問作指導，使這套大型圖冊的科學性、資料性和觀賞性相結合得盡可能地完善完美。但是，由於我們的力量有限，主要任務由中、青年人承擔，其中的錯誤和不足在所難免，因此當我們剛剛開始進行這一工作時，誠懇地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評指正和建設性意見，使以後的各卷，能達到更理想之目的。

感謝香港商務印書館的忠誠合作！感謝所有支持和鼓勵我們進行這一事業的人們！

1995年8月30日於燈下





導言

杜迺松

體現商周政治制度的青銅禮樂器

中國青銅文明的產生，是古代中國走向文明

時代的重要標誌之一。那些留存至今的青銅器造型優美，紋飾富麗，鑄造精巧，銘文典雅，具有極高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青銅器原屬日常生活用器，其種類和形制多摹仿陶器等質地的器物，但商周社會卻根據禮樂制度的需要製作了一批具有特殊意義的銅質器物，即“青銅禮樂器”。統治者為維護國家政權，建立了一整套禮樂制度，以顯示“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左傳·莊公十八年》）的等級差別，賦予上至天子、下至士等不同等級的貴族以不同的權力。

青銅禮樂器直接為禮樂制度服務，被貴族用以祭天祀祖、宴享賓朋、賞賜功臣、紀功頌德及用作隨葬品等。其中鼎是最重要的器種，成為國家政權和個人社會等級的典型代表器物。例如周朝的九個鼎是國家社稷的寶物，佔有它意味着佔有王權，九鼎是周朝王權的象徵。古籍記載：“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也。”（《公羊傳·桓公二年》何休註）規定了不同等級用不同數量的鼎，這種制度被稱為“列鼎制度”。此外，樂鐘的等級制度也很鮮明，所謂“宮懸、軒懸、判懸、特懸”，即天子使用樂鐘時可四面排列，諸侯三面排列，大夫兩面排列，士一面排列等等。

故宮博物院收藏青銅器約一萬餘件，是藏品最豐富的博物館之一。自商周至明清，各個時期的藏品應有盡有，體現了中國古代青銅器完整的發展演變體系。從器物種類看，有商周時期的禮樂器，兩漢時期的生活用器及宋以後的仿造器等等。這些藏品大部分為清宮舊藏，還有一部分是私人捐贈和考古發現品。本卷選取商代至戰國具有代表性的青銅禮樂器189件（套），既體現了中國青銅時代的政治、經濟制度，同時側面反映了當時物質文化和科學技術的發展。

承前啟後的夏代青銅器

青銅是指在銅中加入錫或鉛，根據添加的數量和比例，使之降低熔點和增強硬度，其物理特

性較之紅銅有很大的優越性。中國在夏朝時進入青銅時代，至商、西周時達到高峯，春秋之後開始衰落。

關於中國青銅器的起源，《世本》中有“蚩尤作兵”的記載，即蚩尤以銅器做兵器，但迄今尚未得到實物的證明。近年來在黃河流域的很多地區都發現了原始社會後期如馬家窯文化、馬廠文化、齊家文化、龍山文化等青銅或紅銅製品，或與冶銅有關的遺物和遺跡，因此這時期被稱為銅石並用時代。當時的青銅加工方法有鍛和鑄，器物種類主要是小件的工具、兵器和裝飾品，如錐、鑿、刀、斧、指環和銅鏡等等。其中甘肅東鄉林家馬家窯文化和甘肅永登連城馬廠文化遺址出土的用單範鑄成的兩件青銅刀，是目前發現最早的青銅製品，表明至少在5000年前，中國已出現了青銅器。河南登封王城崗龍山文化晚期第617號灰坑內發現了一件銅鬻殘片⁽¹⁾，證明此時已能鑄造青銅容器，其時間與夏代銜接。

約公元前21世紀中國出現了第一個王朝——夏。河南偃師的二里頭文化，經測定時代約在公元前1900年至前1600年，時間正在記載的夏代紀年之內。二里頭青銅製品中不僅有工具、武器、裝飾品，而且還有容器和樂器，如鋒、鑿、錐、刀、魚鈎、鏃、戈、戚以及爵等。

在鑄造技術上，小件的實體工具和武器用簡單的單扇範鑄成，而銅爵、銅鈴等空體器，製作比實體器複雜，通過對銅爵鑄痕的觀察，當時已採用多合範的製作方法了。特別值得重視的是出現了鑲嵌綠松石的銅器。二里頭銅器，除少數為純銅外，大部分為青銅器，能鑄出含錫量較高的容器和工具，有些還採用銅、錫、鉛三種元素的合金。

儘管夏代青銅製品的數量和種類還較少，且以小件製品為主，有的製品還很粗糙，但青銅空體器(尤其是爵等)的出現，反映了青銅器鑄造技術和工藝水平的發展。用綠松石鑲嵌的銅器圖案佈置得協調勻稱、富麗精美，武器鋒銳堅硬，器表多素面，但一些器物開始出現簡潔的乳釘紋、雲紋和弦紋。二里頭夏代青銅文化，在中國青銅冶鑄史上是承上啟下的重要階段。

鑄造高峯的商代青銅器

商代青銅器的發展可分為兩個時期：從商湯立國至盤庚遷殷前為前期；盤庚遷殷至商亡為後期。

商代前期以河南鄭州二里岡出土的青銅器為代表。已有較多的禮器和武器，能鑄造大型方鼎和圓鼎，器物裝飾性加強了，銘文已萌芽。這時期青銅器造型準確，器壁勻薄，最能反映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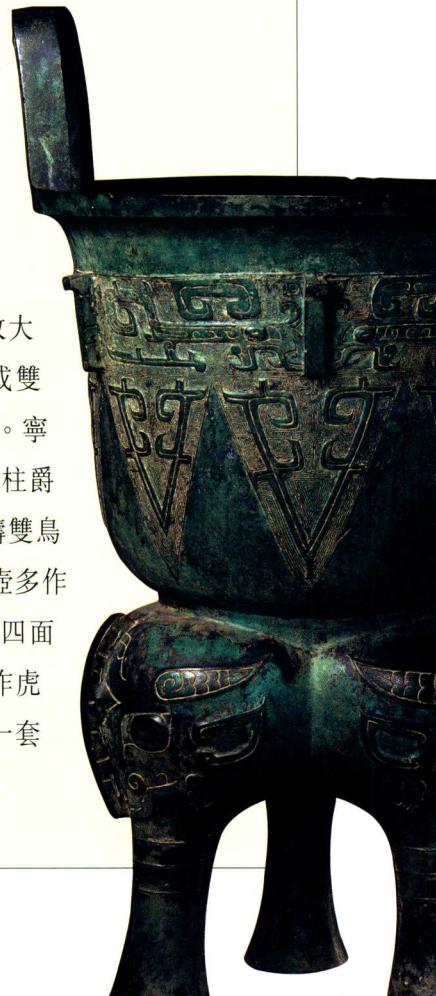
時冶鑄水平的是出土了幾件前所罕見的近百斤重的大方鼎。與二里頭時期比較，這時青銅器的種類已大為豐富，食器有鼎、鬲、甗、簋；酒器有爵、斝、觚、罍、尊、盃、卣；水器有盤；武器和工具有戈、鎒、鉞、戟、鑿、鑊。

造型已不是簡單地移植其他質料器物，而是依據青銅的質料和色澤特點進行創造。鼎、鬲、甗多深腹，圓形鼎作三錐形空足，雙立耳外側做成曲槽，一耳與一足相對應，另一耳在另兩足之間。簋少見，一般深腹，無耳。爵、斝多平底（圖66、69），爵不束腰，雙柱較短；有的斝腹作袋足狀（圖71）。觚體粗短，個別的觚口部帶流。尊長頸，寬肩，腹下收，高圈足。盃作長體，三袋足，半圓形鑿，上部有穹隆頂，頂的前部有筒狀流（圖94）。盤無耳。鉞體呈長方形，戈援狹窄。紋飾簡單、質樸，多無底紋的單層花紋，常見兩夔紋上捲合成一獸面紋，上下是圓圈紋作邊框。此外還有雲雷紋、圓渦紋、弦紋、圓圈紋。方鼎左、右、下方有乳釘紋。銘文少見，有一些族徽式圖案。

商代後期，冶銅、鑄造更加專業化，青銅器製造達到了高峯，數量龐大，鑄造精緻，種類繁多，造型莊重，花紋細密，銘文典雅。以當時的國都安陽殷墟出土物為代表。殷墟青銅器早在宋代已有著錄，近百年所出更為豐富，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即出於安陽武官村⁽²⁾，為商後期青銅器的代表作。該鼎為中國已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在世界青銅文化中也是僅見的，反映出商後期青銅鑄造的高度發展。

器類上出現了新品種，食器主要有孟、豆、匕等；商人善飲酒，因此酒器最發達，主要有壺、觶、角、觥、方彝，及各種鳥獸尊，如象尊、鳥尊、虎尊、豬尊、羊尊等；樂器有鎣；兵器和工具有弓形器、獸頭刀、冑、斧、鏟、鋸；車馬器有轔，等等。

形制上三足器多為柱足。鼎有圓形、方形、分檔等形式。蒸食器中如獸面紋大甗，作圓形，為鬲、甗合體，形體高大，渾厚凝重（圖7）。簋常見為無耳或雙耳，本卷所收乳釘紋三耳簋（圖11），器腹上有三耳，有別於常例，風格獨特。寧豆（圖12），淺腹，短校，豆在這時殊為少見。爵凸底，雙柱加高（圖67），單柱爵也有發展。斝多作長圓腹或分檔，冊方斝（圖70）體呈方形，四足外侈，蓋鑄雙鳥鈕，莊重典雅，堪稱稀世之珍。觚呈細長喇叭狀，出現凸起的觚腰（圖73）。壺多作長頸，鼓腹，頸上一對貫耳（圖92）。卣有圓、方和筒形，有的方形卣在腹部四面各有一長方形孔，兩兩相互穿透，稱“十字孔方卣”（圖81），別致精巧；有的作虎噬人形或鴟鴞形（圖83）。盤高圈足，淺腹（圖127、128）。樂器有3件或5件一套



的小鏡，已有了半音觀點，為十二律奠定了基礎；獸面紋大鏡（圖142），通高66厘米，銳距48.5厘米，身飾粗線條獸面紋，為罕見的大型鏡。戈主要有“直內”、“曲內”和“鑿內”幾種形式，嵌紅銅棘紋戈（圖165），在援脊上鑲嵌紅銅勾棘形紋，商代獨此一例。此外，還出現了有胡有穿戈，穿有三穿或四穿。矛體寬大，有鑲玉刃的矛（圖166），柄為青銅，矛頭玉質，顯然不是實用武器。鉞方體，為儀仗用具，獸面紋大鉞（圖163），有梅花和小獸面圖案，厚重中見精巧，威嚴中現精美。

器物紋飾豐富多彩，有主題花紋和襯托花紋，有些在主紋上再填花紋，形成三層紋飾，更顯繁縟富麗。花紋內容仍以獸面紋和夔紋為主，三羊尊（圖75），腹部飾獸面紋，雙眼凸出，神秘怪誕，令人望而生畏。夔紋的形象多為一角，一足，張口，尾上捲（圖4），常飾在器物的頸部或圈足上。還有一些寫實的動物紋，如友尊（圖77），器腹以簡潔的線條勾勒出九隻象，形象生動、優美；牛紋卣（圖85），頸與蓋沿飾牛紋；還有鳥紋（圖89）、蠶紋、蟬紋、魚紋、龜紋等。幾何形圖案主要有雲雷紋、弦紋、圈帶紋、乳釘紋、圓渦紋等等，多作輔助紋飾。

造型手法上採用平雕與圓雕相結合。鑄造方法較之前代更為複雜，例如醜亞方尊（圖76）、醜亞方罍（圖78）、三羊尊等器肩上的獸頭、象頭和羊頭都是先單獨鑄成後，再嵌入器身的外範內與器體合鑄，稱為分鑄法，說明此種方法在商後期已非常發達。還有些器物的棱角與中線處常飾有扉棱，以增強雄偉感，亦成為這時期青銅器裝飾的特點。



商代後期銘文開始發展，一般較簡短，一二字或十幾字，少數銘文可達四五十字。內容有的標明器主的族氏，即族徽，如：“醜亞”、“寧”、“車”；有的反映祭祀的祖、妣、父、母、兄等，如“祖辛”、“父戊”、“母辛”；有的反映上級對下級的賞賜，如六祀邲其卣銘文（圖88）中的賞賜寶玉，小臣缶方鼎銘文天子對小臣缶賞賜禾稼，毓祖丁卣（圖82）銘文中記有“錫釐”，即賞賜祭祀時的肉食；還有的反映征伐。因此，青銅器銘文對當時的家族史、祭祀制度、社會生活和古代民族關係史的研究都是極重要的資料。

禮樂制度完備的西周青銅器

西周建立了遠比商代更加完備的政治制度和禮樂制度，作為這種制度集中體現的青銅禮樂器，也就成為鞏固國家統治的重要工具。反映在器型種類、風格特點上，必然有一些新的發展變化。西周青銅器長篇銘文較多，內容的真實性與可靠性遠勝過文獻史料，可與史料相互補證；一些銘文內容還可以反映出做器的明確時代和王世所屬，可作為斷代的標準器。因

此，銘文是衡量這時期青銅器價值的重要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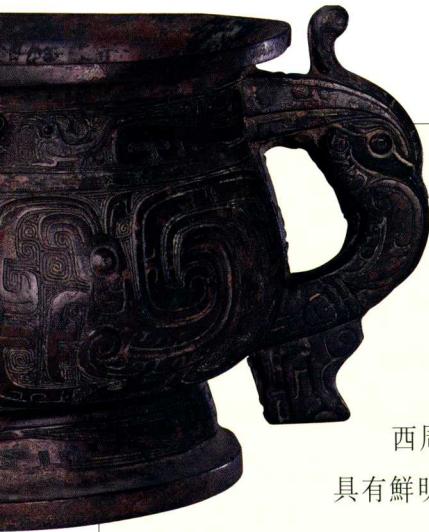
西周青銅器大體可分為兩個時期：從武王至穆王為西周前期，年代相當於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10世紀中葉；恭王至幽王為西周後期，年代相當於公元前10世紀中葉至公元前8世紀。

西周前期的青銅器主要繼承商後期的形制，但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莊嚴厚重是這一時期的主要風格，銅器數量遠遠超過商代。食器主要有鼎、簋、甗、鬲。酒器有爵、角、斝、觚、觯、尊、鳥獸尊、卣、壺、方彝、兕觥、勺等。酒器雖然品種齊全，但數量比商代減少了，這與西周王朝吸取了商紂“酒池肉林”而致亡國的教訓有關。水器主要有盤。陝西出土了三件一編的甬鐘，是最早的編鐘。懸鐘的使用使音質更佳，音調更準確。青銅武器有周族特有的勾戟，劍始萌芽。組合酒器的器座——禁開始出現。此時產生了列鼎制度，反映了禮制的加強。用鼎的多少是隨名位的不同而有區別的，鼎的形制、花紋相同，但尺寸據器主的等級依次遞減，形成由大而小的序列，這就是“列鼎制度”（或稱“升鼎制度”）。大量傳世及出土的鼎，證實了這種制度的存在。

形制上，三足器如鼎、甗的柱足與蹄足並存，雙耳在口沿上（圖15、16）。鼎腹有的很淺，典型作品如成王時的師旅鼎（圖17）。康（王）、昭（王）時的鼎、簋、尊、卣、方彝之腹下垂。有的圓鼎，圓形底下面再置一盤，用以置炭加熱，這種小巧玲瓏的實用器是此時期的新發明（圖14）。簋開始出現新的形式，如圈足下附方座，簋身附四耳（圖29）等。鬲多有腹耳，如師趨鬲（圖25）。一般認為青銅簋出現在西周中後期，本卷所收的一件夔紋大簋（圖42），長方形體，四角呈圓形，飾典型的夔紋和輻射狀直線紋，具有西周早期器的特點，是現存最早的一件青銅簋。

此外，製作規整、紋飾精美的鳥紋爵（圖97），腹耳平蓋鼎、高領鬲、四足盃、方形圓口或有鑒尊（圖99），長身長頸貫耳壺（圖107）、雙耳盤等，形制上都有別於商後期的同種器物。戈援加寬，胡加長，有一穿至三穿（圖168），還有四穿戈。

獸面紋和夔紋仍是主要紋飾題材，但有所變化和創新，如出現了捲體夔紋（圖27）、獸頭鳥身紋。雙身龍紋在方形鼎的頸部表現得尤為突出。鳳鳥紋常飾在銅器的重要部位，華麗醒目，如伯作簋（圖30），腹部有兩隻相向的鳳鳥紋飾；鳥紋爵上左右對稱的長尾高冠的鳥紋；鳳紋觶（圖98）器身明顯凸起的三道鳳鳥紋，具有強烈的立體感。巴蜀地區出土器有一首二身的牛紋，風格奇特。幾何紋也有一定的發展，水鼎（圖15）、夔紋簋的直線紋簡潔樸素。一些器物上飾有高大的扉棱，或平雕動物的某一局部翹出器表，宏偉奇美。



銅器的銘文較之商代有所發展，出現了上百字的長篇銘文，字體仍沿襲商後期的波磔體，內容主要有祭祀、策命、訓誥、賞賜、征伐，其中訓誥、策命等內容是商代未見的。

西周後期青銅器多輕薄簡陋，製作質樸，紋飾亦趨向簡單，但長篇銘文增多，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

酒器中的爵、角、斝、觚、觶、方彝等基本消失，保留有壺、罍、盃、尊、鳥獸尊等器種。盛食器簋（圖43）、盨（圖46），注水器匜，均為新出現的器種，實用性強。鳥獸尊更為發達，新出現了兔形尊。銅鐘發展到四件、六件和八件為一肆。“列鼎而食”的列鼎制度尤為盛行。

器形上有新變化。鼎、甗多蹄形足，典型的有大鼎（圖19）、克鼎（圖23）等；有些鼎在口沿一側有流口，如龍紋有流鼎（圖24）。簋除在圈足下加方座外，有的還附有三小足，如師酉簋（圖31）、毳簋（圖34），有蓋簋也增多了（圖35）。鬲作折沿、折足，本卷所收的刖刑奴隸守門鬲（圖26），上部為容器，下部帶火灶，兩扇可開合的灶門，外鑄圓雕刖刑俑人，形制極為特殊。簋侈口，斜下收腹，器與蓋各有四矩形短足。盤腹有耳（圖129），出現了方形盤（圖130）。壺長頸，有套環耳（圖109）。戈援前鋒呈等腰三角形。

紋飾上的變化也體現了時代特點，出現了一些新的紋飾，如刖刑奴隸守門鬲腹上的環帶紋，格伯簋（圖33）方座立面的竊曲紋，頌簋（圖37）圈足上的鱗紋，鬲從盨（圖45）頸部所飾的一周重環紋等等。獸面紋一般不再做主題裝飾，而僅飾在器足上。鳳鳥紋繼續流行，如追簋（圖32），通體飾回首垂冠的夔鳳紋。圓雕裝飾有所加強，如虎飾鐘（圖148），在獸面紋中心部位鑄一翹尾露牙、躍躍欲奔的圓雕虎，精美詭譎。有的器物素面或僅有幾道弦紋，如頌鼎（圖18）、大鼎，全器光素，僅在頸部飾兩道弦紋；一些花紋粗獷潦草。這與此時期器物多注重銘文有關。

青銅器銘文對研究古代史、校正古籍以及研究古文字的形、音、義等方面均具有很高的價值。今藏台灣故宮博物院的西周宣王器毛公鼎，銘文長達497字，是目前所見最長的青銅器銘文。本卷所收的西周後期重要的長銘青銅器，有頌鼎、大鼎、師酉簋、格伯簋、頌簋、諫簋（圖39）、揚簋（圖40）、豆閉簋（圖41）、克盨（圖44）、鬲從盨等。這些銘文的內容涉及廣泛，反映了青銅器為禮樂制度服務的突出作用。

首先，最多的是祭祀。《左傳·成公十三年》記：“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是奴隸制國家

的重大事情，西周青銅器銘文關於祭祀的反映最為突出，追簋、杜伯盨、虢叔旅鐘（圖145）、頌簋等，均是為紀念祖先而做的祭器。從銘文表面內容看，作器者祭祀祖先的目的是為自己和子孫後代祈福祈壽，實質上是通過祭祀先祖的形式來維繫宗族的血緣關係，以鞏固宗法制度。

第二，策命與賞賜。策命大多是天子對臣下的任命，其內容就是一份任命書。也有侯伯對下屬的命賜。策命地點一般在宗廟、王宮或太室。策命後常賞賜物品，包括土地、山川以至奴隸等。如頌鼎、豆閉簋、師酉簋等器的銘文。策命銘文對策命制度、禮儀制度以及各種名物的研究均有重要價值，可與文獻相互印證並作補充。

第三，戰爭與征伐。西周國家對外戰爭與征伐的目，金文中不少名篇都反映這一內容。如虢季子白盤，銘文記述了虢季子白受周王之命征伐西北境內的強族獫狁。師旅鼎（圖17）銘文記師旅眾僕因不隨從周王征戰方國，而被上級白懋父罰幣三百，反映了西周早期士兵反戰的情況。這些記有戰爭內容的金文是我們研究西周後期政治、軍事和民族關係的重要資料。

第四，反映土地制度的變化。西周土地屬於周天子所有，他可以把土地以及耕種土地的奴隸賞賜給臣下和諸侯，讓其世代享用，臣下與諸侯只有使用權而無所有權，並且要定期向周王交納貢賦，周王也可以隨時收回土地。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銅器的銘文也有貴族之間以物換取田地的記載，如共王時的格伯簋銘文記載，格伯用四匹良馬換取了倂生的三十田，雙方訂下了契約。西周中期以後出現了私人佔有土地的現象，國有土地制度漸被破壞。但這一時期貴族在交換田地的過程中，形式上還要尊重王廷，向王朝大臣報告。私人佔田現象的出現，是與西周中期以後政權走向衰落的形勢緊密相關的，用金文資料結合歷史文獻，可以看出西周中後期土地制度演變的軌跡。

此外，西周後期銅器銘文的內容還有很多，例如買賣奴隸、劃疆界及盟誓、反映刑法等方面的內容等等。

後期銘文文字排列均勻整齊，字體嚴謹精到，書法嫋熟，豎筆呈上下等粗的柱狀，稱“玉筋體”。大克鼎還採用了方格，格內填字。虢季子白盤的銘文讀之朗朗上口，具有很濃的韻味，書體圓轉秀美，開小篆字體之先河。

變革出新的春秋青銅器

春秋時代是政治、經濟大變革的時期，鐵製工具在農業、手工業中的使用促進了經濟的發



展。在青銅鑄造業上王室鑄器減少，諸侯國則普遍鑄器，不僅晉、楚、齊、魯、吳、越、秦等大國鑄器，而且紀、薛、費、黃、鄧等小國也有自己的青銅冶鑄業。在青銅器鑄造上，透露出變革時代的氣息，創造了不少嶄新的內容。

青銅工藝進步的突出表現是分鑄法的發展。出土於河南新鄭的蓮鶴方壺（圖112），形體巨大，器底與器身的虎、龍，蓋頂展翅欲飛的仙鶴，均採用分鑄法，取得了凝重活潑的藝術效果。

這時期的青銅器還採用了失蠟鑄造法，反映了青銅工藝的高度發展。在紋飾裝飾上採用拍印印模法，即用刻有花紋的陶或木質拍子，在範模上按印出連續成組的圖案。此前青銅器紋飾需先在陶模上雕刻，工序繁瑣，拍印法則省時、迅速，提高了生產效率。這時期最流行的細密的蟠虺紋一般都採用這一方法，四蛇方甗（圖51）的甗上有勾連雷紋即用此法。青銅鑲嵌工藝進一步發展，嵌紅銅工藝有獨特的魅力，如嵌紅銅狩獵紋豆（圖56），圖案鑲嵌之精令人讚嘆。

器類上，食器有鼎、鬲、甗、簋、簠。盛食器中的球形敦、帶蓋豆，酒器中的尊缶，盛水或盛冰的大鑑，水器中的盥缶、鉶，樂器鎛于、鉦、句鑼等等，都是這一時代極富特色的器物。青銅武器中的戈、矛、戟、劍數量很多，並常見附件鐏和鐓。

器物形制上，鼎多有蓋，蓋上有三獸鈕或三環鈕，足作外侈的蹄形（圖49），尤以楚式鼎最為典型。楚鼎中還出現了束腰平底、淺腹、三短蹄足、口沿二耳外侈之鼎，自名為“斬”。簋（圖53）、壺、匱（圖54）的蓋常以蓮瓣為飾。蓮鶴方壺在蓋的雙層蓮葉間還立一圓雕之鶴，堪稱瑰寶。有的簋沿襲西周方座特點，腹側有雙龍耳。甗多呈方形，鬲、甗分體（圖52）。簋口縮小了外侈的角度，簋足加高。豆腹加深，多有蓋（圖63、64）。新出現了似瓢的無足匜。孟雖仍存，但形體較西周為小，如浙江出土的伯駢孟（圖57）。甬鐘、鈕鐘、鎛鐘並存，已發展到十幾件一套。戈、矛分鑄，戟加多。戈援上揚，三穿、四穿習見（圖171）。有的戈內部呈透雕的鳥獸狀（圖169、170）。矛體向細長發展，加強了刺殺力。

如西周後期之粗獷簡單的花紋此時已少見，代之而起的是工整細密的網狀蟠虺紋。虺紋實際上是許多小蛇相互纏繞而構成的圖案（圖113），這種圖案的流行與拍印法的使用密切相關。吳越地區銅器常飾錐刺紋，也有蟠蛇裝飾。楚地銅器常飾鼓凸呈粟粒狀的變形蟠螭紋，其形有若飛濺的浪花。春秋晚期線刻畫像開始萌芽，江蘇六合程橋發現了幾片有線刻畫像的殘銅片，刻有野獸、樹木、人物，線條簡單，生動古樸。人事活動圖案的出現對研究當時的生產、生活狀況及社會禮俗等都有重要的價值。

社會變革對銘文內容及書法藝術也有一定的影響。春秋時代青銅器銘文不如西周豐富，上百字的長篇很少見，齊叔夷鐘一組銘文共492字，已屬罕見。銘文內容多祭祀，也有為自己或他人作器的。由於禮制衰落，以銅器作女兒陪嫁的媵器數量較多，如陳子匜（圖136）銘。同時用青銅製作的“弄”（玩）器也開始多起來。

由於諸侯國林立，金文書體也表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字體有瘦體，有肥體，還有的刻意仿商周波磔體，在求工的基礎上加強了字體的變化和裝飾性。晉國還出現了頗具奇趣的蝌蚪文，如少虞劍（圖173）銘文。江淮一帶的劍、戈、矛等武器常裝飾曲繞迴旋的鳥蟲書，可算是當時的一種美術字，極具裝飾色彩。

地域特點鮮明的戰國青銅器

戰國時代，鐵工具在青銅鑄造業中使用，為青銅器注入了新的活力。生活用器增多。常見的器種主要有鼎、豆、壺、盤、匜、缶。輕便實用的銅器主要有球形敦、圓腹盃（圖126）。湖北隨縣戰國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了形體不大、體作卵形的細長足敦。編鐘尤為發達，著名者有曾侯乙編鐘，本卷收有一套9枚的蟠螭紋編鐘（圖159）。鳥獸尊仍存，以陝西興平豆馬村出土的犀牛尊最佳。青銅武器變化很大，這與戰爭形式從車戰變為以騎兵和步兵為主有密切關係。戈、矛與分體戟盛行。

戰國早期，青銅器的形制仍沿襲春秋晚期的一些特點，中、晚期變化較大。鼎足普遍低矮（圖59、60），蓋上常有三犧、三環或三鳥鈕。簋足變高，口不再外侈，上下常有子母卡口，器變深（圖62）。甗下部的鬲僅有三短足，開始向秦漢時的釜演變。球形敦仍存。豆普遍作長校（圖64），尤以北方燕國豆最為典型（圖63）。壺有圓、方（圖120）、扁（圖124）和圓形帶流的（圖121），也有高足、瓠形（圖122）、魚形（圖123）和鷹首形的。盃作圓腹、有流，有鑿和提梁。戈援與矛體細長，戈援上揚，三穿與四穿戈習見（圖176、177），有的內末有斜刃。分體戟增多，曾侯乙墓有三戈一矛的同柵戟，是一種新式武器。用作矛、戈柵飾物的𨱔、镦數量很多，如大良造鞅镦（圖183）、錯銀馬足𨱔（圖185）。青銅劍數量多，大多格、首俱全，有的莖上纏有“緼”（絲線），其中尤以吳越地區出土的最佳，一些劍上還有錯金銀或嵌松石等裝飾（圖180）。無格、無首、扁莖似劍的鋟此時出現（圖181、182）。調兵遣將的符多作虎形，也有鷹形的（圖187）。

這時期銅器紋飾內容豐富，壺、豆、鑑、匜等器上常刻有大幅的平雕畫像，嵌紅銅宴樂漁獵攻戰紋壺（圖118），為宴樂、採桑、漁獵、攻戰紋，是為貴族的禮儀活動，對研究當時的生